

日本人类学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历程与范式转换*

龚浩群 李一言

内容提要 东南亚区域研究是日本人类学界借以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方法,也是日本知识界沟通世界,生产独创性知识的重要场域。在帝国早期的日本,针对东南亚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服务于殖民统治,试图论证日本民族起源假说。二战结束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与日本的民族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契合,逐步确立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学科规范,并试图相对客观地认识东南亚。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对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实践应用与现实关怀,倡导连接“自我”与“他者”,共同面对日益深刻的全球性问题,积极推动人类学知识向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所在社会的公共回归,即所谓“知识的社会还原”。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在不断反思“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过程中,完成了从自证(证明自己是谁)、证他(证明他者是谁)到两全(自我与他者相互成全)的范式转换。

关键词 日本人类学 东南亚研究 文化人类学期刊 知识的社会还原

东南亚一直是日本人类学的重点研究区域之一。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走过了近百年的道路,其成果在学科发展、区域研究和政策制定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对日本人类学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历程和范式进行历史梳理,着力分析日本人类学界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对于我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以及区域国别研究都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参照意义。

本文将对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成果进行学科史考察,重点把握其阶段性特征和代表性成果,并置身于学术生产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审视,这就涉及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演变,日本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以及日本人类学自身的转型。本文采取的分析策略是以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学学术团体——“日本文化人类学会”(JSAC)及其机构刊物《文化人类学》所涉及的重要学者、论文以及著作作为主要线索,梳理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与现状,同时也结合国内外学界关于当代日本人类学学科发展趋势的论述,基于日本人类学学科的整体视域,勾勒该领域的演变路径与趋势。

日本人类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针对日本殖民地开展研究。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产业复苏并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日本人类学界又重新展开对东南亚诸国的田野工作。20世纪60年代,日本陆续建立起与东南亚区域研究相关的综合性学术研究组织与机构,该领域进入快速发展期。日本人类学对东南亚的关注聚焦于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四个在历史与经济上与日本颇具渊源的国家。近年日本人类学界对越南、老挝的学术兴趣呈上升趋势,但针对其余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仍显冷清。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海外新华商社会公益实践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2ASH00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是致力于传播和发展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术团体,目前拥有 2000 余名会员。其前身是成立于 1934 年的“日本民族学会”,出于学科在日本发展的种种考量,经过数年讨论最终于 2004 年更名为“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并沿用至今。^①《文化人类学》是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发行的机关刊物,2004 年之前刊物名称为《民族学研究》,是日本学界最具权威和代表性的人类学专业期刊;1935 年创刊至 2021 年共发行 86 卷,每卷 4 期,共收录了包括原著论文、特辑论文、会议论文、研究报告、书评等在内的 1966 篇学术性论文,平均每卷刊登 20 余篇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的论文。该会自 2006 年起设置“文化人类学奖”,旨在褒奖为日本人类学发展与人类学研究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日本人类学者。日本人类学中以东南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学者绝大部分都是或曾是该组织会员、理事乃至会长,获得诸如文化人类学奖等各类学术褒奖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因此,以该学会及其刊物中涉及的学者、论文以及著作作为线索梳理日本人类学东南亚区域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从 1935 年学刊创刊直至 2020 年,《文化人类学》共发表了 159 篇以东南亚诸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书评除外),约占学刊发文总数的 1/10(见表 1)。以 10 年一计为单位来看,1935—1945 年一共发表了 6 篇文章,1945—1956 年仅 1 篇论文,1957—2011 年发文频率保持每十年 25 篇上下并趋于稳定,2012—2020 年仅统计了八年的数据,目前刊登 19 篇文章。从国别研究来看,在东南亚 11 国中,涉及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文章较多。从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总数来看,针对东南亚区域的研究已经构成了日本人类学的重要领域。

表 1 1935—2020 年《文化人类学》刊发东南亚诸国相关论文数量

年份/国别	1935—45	1946—56	1957—67	1968—78	1979—89	1990—00	2001—11	2012—20	总数
印度尼西亚	3	-	10	4	17	5	10	4	53
泰国	1	1	10	10	-	4	6	1	33
菲律宾	1	-	3	7	6	6	6	3	32
马来西亚	1	-	1	2	1	4	4	2	15
老挝	-	-	3	-	-	-	1	6	10
越南	-	-	-	-	3	4	1	-	8
缅甸	-	-	2	-	1	1	-	1	5
柬埔寨	-	-	1	-	-	-	-	1	2
新加坡	-	-	-	-	-	-	-	1	1
总数	6	1	30	23	28	24	28	19	159

数据来源: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文化人类学》期刊 1935—2020 年收录论文数。

① 日本人类学从 1884 年发端之时就以体质人类学、人种学为主,以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为辅形成了广义的人类学范式。1936 年,主要进行文化、社会性研究的“日本民族学会”从主要进行体质、生物性研究的“日本人类学会”中独立。之后除了二战期间,两会每年都一起联合举办“日本人类学联合大会”。然而,随着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细分的趋势,1996 年第 50 届联合大会成为日本广义人类学的终止符。随后,出于对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反思与批判,以及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力持续增强,2004 年“日本民族学会”改称“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民族学彻底从日本学科设置中消失。本文使用的“日本民族学人类学”一词需放在学科语境的变化当中来理解。

通过梳理,本文将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884—1945年为第一阶段,是以体质人类学、人种学以及欧陆民族学为主要方向,试图论证日本民族起源假说并为殖民统治服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东南亚研究成为日本学界借以确证自身身份认同的工具;1945—1985年为第二阶段,该领域与日本的民族国家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相契合,在二战后逐渐走向社会与文化研究,主要以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为指导,通过探险队、调查团的方式进行实地调查,这是开始确立规范学科标准并试图相对客观地认识东南亚的阶段;1985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该领域开始参与世界人类学的主流话题,通过借鉴西方学界以实践理论和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发展出观光人类学等应用性分支学科,并创造性地提出“应答人类学”“知识的社会还原”等概念和主张,倡导在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中打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鸿沟,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携手共同面对日益深刻的全球性社会问题——至此,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在知识范式上完成了从自证(证明自己是谁)、证他(证明他者是谁)到两全(自我与他者相互成全)的历程。

一、日本民族起源假说:殖民主义与日本人类学(1884—1945年)

日本人类学研究开源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坪井正五郎1884年建立的“人类学友会”,两年后“东京人类学会”于东京大学理学部正式设立。同时,受到欧陆传统的影响,日本早期人类学以体质人类学及人种学为主要研究内容。彼时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的坪井正五郎主要教授体质人类学,另一位学者鸟居龙藏教授人种学,大多数课程同时涉及生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大正年间(1912—1926年)伴随着鸟居的出走以及坪井的离世,专注于社会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于1934年建立“日本民族学会”,翌年,学会期刊《民族学研究》创刊;体质、生物人类学者则依然以东京人类学会为据点。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的建立与日本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积极引入欧洲大陆的国家制度、教育体制等关系密切。作为应用科学的民族学人类学被认为对于殖民地的统治与经营有利而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

事实上,制度化的民族学人类学最早诞生于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地区。1928年,在中国台湾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以及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先后设置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室,文化研究被当地殖民政府所看重。发轫于日本帝国边缘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更强调功能主义视角以及田野调查方法,而处于帝国中心的东京人类学研究则偏向于文献工作,也就是摇椅式的人类学研究。^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民族学人类学主要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需要,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以体质人类学与人种学为主,综合先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神话学等不同学科,形成了广义人类学学科样态;其次,研究兴趣大多聚焦于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②最后,出于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和经营的需要,作为应用科学的民族学人类学被彻底政治化。^③

^①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Colon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thropology in Japan*, London: Curzon, 1999, pp. 71-115.

^② 自19世纪90年代日语“民族”一词产生以来,“大和民族”“日本民族”“出云民族”“天孙民族”等民族自称在日本出现并成为描述该民族的通用词汇。二战前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日本民族”是由旧石器时代开始,从其他大陆迁往日本列岛的人群所组成的“混合民族”。二战期间,为了配合殖民统治需求,日本曾企图扩大“日本民族”的范围以包含朝鲜半岛、台湾等殖民地。战败后,日本倾向于回避民族问题,直至1986年8月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日本单一民族发言”引发巨大争议,同年11月中曾根康弘在巨大压力下重新将“日本民族”定位为包括阿依努等原住民在内、祖祖辈辈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所有人。可参考:岡正雄、八幡一郎、江上波夫『日本民族=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国家の形成』『民族学研究』,1949年、第13号;岡本雅享『日本人内部の民族意識と概念の混乱』『福岡県立大学人間社会学部紀要』,2011年、第19号。

^③ 山路勝彦『日本の人類学』兵庫: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20頁。

在此背景下,日本早期的东南亚研究不可避免地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策略捆绑为一体。193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南进”政策,开始对中国西北、东南亚以及印度的穆斯林社会进行情报收集工作,由此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机构与组织,如回教圈研究所、大日本回教协会、南洋厅、民族研究所等,以满足其对外侵略的目的与殖民地统治的需求。这一时期的东南亚研究是处于对中国侵略政策的延长线上所进行的战略需要,主要集中在对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以及菲律宾摩洛族的宣传抚慰工作。^①多数研究处于日本军队的严格管控中,很难说是当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绝大部分所谓的研究仅在于借东南亚的地理、民族、政治等表象,以及各类二手材料探讨一些抽象的如人种语意^②、东南亚范畴、民族学研究对象等概念。这些研究往往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东南亚视作“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进行讨论。不少社会文化学者如竹内好、石田英一郎、衫浦健一、冈正雄等都与这些组织机构产生过交集,甚至领导某一机构。其中冈正雄的日本民族起源假说与日本东南亚人类学研究的起始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冈正雄(1889—1982年)是战时及战后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界主要领导者之一。1925年他与柳田国男合作创刊《民族》。1929年他获得大财阀涩泽敬三的资助,前往维也纳大学攻读民族学,求学于奥地利民族学家施密特(Wilhelm Schmidt, 1868—1954年)门下。他在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1940年归国着手建立民族研究所,1943年获得日本帝国政府公允设立作为国策机关的民族研究所,主要从事包含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及周边国家的民族志、民族史、民族政策相关的调查研究,为日本帝国殖民地的管理与统治工作收集基础资料。冈正雄担任总务部长期间将民族学协会(现日本人类学会前身)整合为研究所的外围协作组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民族研究所随之撤销建制。^③

冈正雄基于历史传播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假说。他秉持“种族文化复合说”,认为日本民族并非原初且孤立地诞生于日本海岛,而是至少来自五个临近地区,即美拉尼西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北亚—通古斯地区、中国南方地区、阿尔泰—朝鲜半岛地区。^④虽然冈正雄及其领导的民族研究所在二战期间直接针对东南亚地区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较少,但其关于日本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之间亲缘关系的假说直接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学界针对东南亚地区开展的大型人类学实地调查。^⑤

冈正雄这一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假说为日本帝国殖民侵略亚洲诸国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理论支持,建构了支配话语的合法性。他认为民族学研究对于日本民族的团结以及民族意识的强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张将民族政策、民族统治以及民族运动纳入日本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内,日本民族学只能建构在“分析被统治对象诸民族的民族性及社会构造的现实基础之上”^⑥。其理论观点在战后日本学界饱受诟病,批判之声不断。^⑦他的核心理论著作《古日本的文化层》至今在日本未得到正式出版。

正是由于日本民族学者与“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政策牵扯过深,导致即便二战结束后,民族

① 田村爱理「回教圈研究所をめぐる」『学習院史学』、1987年、第25号。

② 当时日本学界认为东南亚地区生活着数百体质、文化各不相同的“种族”,人种语意研究便是针对这些不同“种族”名称的界定与分类。详情请参照:淵真吉「東南アジアに於ける人種の語義に就いて」『民族学研究』、1943年、第8号。

③ 中生勝美「民族研究所の組織と活動」『民族学研究』、1997年、第1号。

④ 岡正雄「異人その他—日本民族=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国家の形成」東京:言叢社、1979年、第36頁。

⑤ Chie Nakane,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Japa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 1974.

⑥ 岡正雄「現代民族学の諸問題」『民族学研究』、1943年、第1号。

⑦ 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東京:風響社、2016年、第333—334頁。

学这一学科名称极易使人联想起二战时日本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①,民族学作为一个符号已经成为“负的历史与遗产”。针对这一不光彩的历史,中根千枝等一批二战结束后回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将战前人类学研究称为“民族学”,把战后的人类学研究称为“文化人类学”,提倡所谓的“新人类学”发展,试图摆脱军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阴影,以纯粹的研究者身份进行国外调查,拒绝承认战前与战后研究之间的联系。^② 20世纪末,中生胜美提出“殖民地人类学”这一概念,旨在对这一时期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反思,直面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行径。^③ 基于此类对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加之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力持续增强,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界经过多年讨论,最终于2004年将日本民族学会改称日本文化人类学会。^④ 如今,在日本高等教育以及研究机构中,作为学科名称的民族学也基本被文化人类学所代替。

二、东南亚的调查与探险: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之滥觞(1945—1985年)

二战结束后,日本不仅深陷于物质上的困局,还被一种败落的情绪所笼罩。然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侵略朝鲜半岛的后勤基地,借机重整了国内工业体系,再造了以出口工业制品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曾形容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重建的一剂强心针,犹如天惠,宛若神助”^⑤。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凭借已然成型的工业生产系统,将原本针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改为以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方式提供经济协助、技术支持、国际借贷等所谓的国际援助项目。日本各类制造业巨头借机向东南亚各国大量倾销工业制品,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市场。^⑥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扩展的需求加大,经济上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雁,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为从雁的雁阵发展模式,东南亚被视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撑点之一。因此,善于呈现地方知识原貌并提倡文化差异之理解的人类学开始受到企业财团的重视。^⑦ 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资金日益丰裕,各类海外研究的经费随之大量增加。人类学调查最初集中在东南亚区域,随后拓展至大洋洲、非洲以及东亚各国。^⑧ 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历史上的渊源,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对象一开始就集中在所谓亚洲四小虎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菲律宾四国。

人类学研究在日本社会经济重建过程中顺势发展。1953年只有南山大学、东京都立大学、东京大学三所大学设置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到1959年已有66所大学开设了相关的讲义课程。^⑨ 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主要受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以“社会结构”“组织功能”为学科研究内核,重视田野调查及民族志编写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对历史主义研究手法进行了辩证扬弃,不仅重视共时研究,对历时研究也持肯定态度,在保持学科独立性的基础上倡导跨学科研究。^⑩ 这种学科取向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活跃于战争时期的冈正雄、石田英一郎等在二战时期的实地调查中,由

① 石田英一郎『石田英一郎全集卷四』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第17頁。

② 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東京:風響社、2016年、第25頁。

③ 中生勝美『植民地人類学の展望』東京:風響社、2000年、第35-38頁。

④ [日]中牧弘允著,刘正爱译:《日本人类学三讲——中牧弘允在北大的演讲(连载之一)》,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⑤ 崔善愛『日本と朝鮮戦争』『週刊金曜日』、2019年、第1237号。

⑥ 大庭三枝『日-東南アジア間の歴史認識をめぐる諸相』『アジア研究』、2020年、第4号。

⑦ 麻国庆:《现代日本人类学的转型和发展》,载《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⑧ 松園万亀雄『国際協力と人類学の接点をもとめて』『国際協力研究』、1999年、第2号。

⑨ 祖父江孝男『全国の大学における民族学・人類学関係の講義一覧』『民族学研究』、1959年、第4号。

⑩ 岡正雄『民族学における二つの關心』『民族学研究』、1948年、第4号。

维也纳历史学派转向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他们在战后三四十年中继续领导着日本人类学界;^①另一方面,中根千枝、蒲生正男等战后日本人类学重建时期的中坚力量都曾留学西方,主要受到英国、法国人类学传统的影响,重视以“社会”为导向,以结构与功能为着眼点指导田野实践的人类学理论研究。

除此以外,从明治时代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日本民族起源的巨大关心如通奏低音一般潜藏于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②二战结束后,以冈正雄、石田英一郎等民族学者为首组织成立了“日本文化研讨会”,通过比较日本与东亚、北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等临近的民族文化,达到追寻日本民族起源的目的。^③这一对日本民族文化以及起源的关心,与20世纪60年代日本战后民族国家的重塑以及沸腾的左翼运动相契合,使得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在战后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对民族起源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关心,也显示出战前与战后研究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延续。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以探险队、调查团形式展开的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和学科规范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其学术意义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

这一时期,日本对东南亚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调查团、探险队的形式进行。当时组织的调查团、探险队有东南亚稻作文化调查团、关西学院大学巴拉望岛学术探险队、大阪市立大学东南亚学术调查队、上智大学西北泰历史-文化调查团等。这些东南亚实地调查团队中的成员不仅有历史学、神话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社会文化研究学者,往往还包括生态学、生物学、医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的主要特征,即倡导并实践跨学科、团队作业形式的实地调查。

在这一众以调查团、探险队形式进行的人类学实地调查中,又以日本民族学协会组织的“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调查团”成立时间最早,组织规模最大,学术成果最丰,最具学科史象征意义。中根千枝向世界介绍日本人类学发展及现状时,曾将此次调查称为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之滥觞。其调查成果刊载于《民族学研究》,被誉为“以规范人类学标准写就的第一批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④。此次针对东南亚的大型田野调查项目并非无的放矢,目的就在于验证冈正雄的日本民族起源假说,即对冈正雄的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论中涉及的东南亚诸民族与日本民族起源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地考证。在冈正雄的领导下,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东南亚地区相对古老但相似的水稻种植技术及其相关文化传统是日本民族东南亚起源的一个重要证据。相比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彼时日本学界更在乎的是文化之间的相似性。^⑤

“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调查”项目在1954年作为“民族学界的紧急且重要的课题”正式启动。当时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的前身,即日本民族学协会由涩泽敬三和冈正雄领导。冈正雄担任委员会主席,涩泽敬三担任后援会长。涩泽敬三利用其在财界及政界的影响力很快从各大财团募集了一千三百余万捐款,又从日本文部省获得四百万调查经费。在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日本民族学协会于1957—1964年7年间先后3次向东南亚派送调查团进行跨学科实地调研。

第一次派送的调查团于1957年8月前往越南、柬埔寨、老挝及泰国等湄公河沿岸国家进行了

① 中生勝美「民族研究所の組織と活動」『民族学研究』、1997年、第1号。

② クライナー・ヨーゼフ『日本民族学の現在』東京:新躍社、1996年、第3-8頁。

③ Shinji Yamashita and Joseph Bosco and J. S. Eades, “Constructing Selves and Others in Japanese Anthropology”,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p. 90-113.

④ Chie Nakane,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Japa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 1974.

⑤ 関本照夫「日本の人類学と日本史学」『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別巻1』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47-123頁。

约8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团由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农学、技术文化、医学等领域的专家以及外务省官员组成,其中人类学民族学相关背景的专家有民俗学家松本信弘、地理学者岩田庆治、社会人类学者绫部恒雄,由曾经求学于莫斯门下的松本信弘担任此次调查团团长。^①第一次调查团的成果于1959年调查结束后率先刊行在《民族学研究》23卷1—2期上,共发表了十篇关于此次调查结果的报告论文。此外,还举办了两次公开座谈会。论文及座谈会主要就低地佬族村落构造、湄公河流域遗迹及遗物、东南亚民俗分类、老挝宋河(Nam Song)和力克河(Nam Lik)流域诸种族的分布与移动、柬埔寨部落及制陶技艺、高地佬族与苗族的农业生活、湄公河流域渔业用具以及概观性的印度支那半岛民族风俗进行了讨论。同年,调查团成员编辑了调查过程中的见闻,由日本读卖新闻社出版,发行了一本面向一般读者的旅行游记——《湄公纪行:民族的起源之旅》^②。第一次调查团的最终学术成果——《印度支那研究: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报告》^③则由松本信弘主编,于1965年正式出版。

此次调查中主要以人类学理论关怀进行调查的是地理学家岩田庆治及社会人类学家绫部恒雄。二人除了对泛湄公河流域诸国进行走访外,还选定老挝中部的数个村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就老挝高地、低地村庄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初步判明。岩田庆治在此次田野调查中深感东南亚与日本文化之相关性。在《日本文化的故乡》一书中,岩田写道:“随着针对东南亚地区及人民田野调查的深入,我时常受到一种‘古式日本文化’的感召,使我不断追问日本文化的源流及其东南亚起源的可能性。”^④在这一追问过程中,岩田由地理学研究彻底转向人类学研究,并在东南亚宗教信仰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以在泰国、老挝等地的深厚田野经验为基础,发展出一套颇有见地的万物有灵理论,闻名于日本学界。绫部恒雄也持续在人类学领域深耕,留下了近百篇论文与著作,相关东南亚研究代表作有《泰族社会与文化》^⑤、《东南亚的论理与心性》^⑥等。其介绍人类学相关理论流派的概论书《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⑦不仅在日本作为课程教材以及专业入门读物广受好评,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也曾作为人类学入门读本盛极一时。绫部也被誉为日本战后人类学重建时期的中流砥柱之一,于1980年当选日本民族学会会长。

第二次派送的调查团于1960年2月前往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巴厘岛、龙目岛及越南南部进行了约3个月的田野调查,主要成员由五名相关专家组成,团长由农学家藤冈保夫担任,由于印尼时局动荡不得不临时中断计划提前归国,成果相对欠佳。但仍就巴厘岛农家亲属制度、稻作仪式、耕种技术及村落类型等问题进行了整理,于1968年整理汇编了《巴厘岛研究》^⑧。

第三次派送的调查团从1963年6月开始,在印度比哈尔邦及尼泊尔进行了约10个月的田野调查,由人文地理学家川喜田二郎和其他三位相关专家组成调查团。此次调查选择南亚部分地区作为目的地的原因在于该地区与日本、东南亚同属稻作文化圈^⑨,主要就南亚地区的水稻种类、耕种技术、宗教信仰、亲属制度以及物质文化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

在第一次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调查团筹划成立的同时,大阪市立大学在梅棹忠夫的带领

① 松本信弘「東南アジア稲作民族文化総合調査経過報告」『民族学研究』1958年、第1号。

② 東南アジア稲作民族文化総合調査団『メコン紀行—民族の源流をたずねて』東京:読売新聞社、1959年。

③ 松本信弘『インドシナ研究』東京:有隣堂、1965年。

④ 岩田慶治『日本文化のふるさと』東京:角川書店、1966年、第9頁。

⑤ 綾部恒雄『タイ族—その社会と文化』東京:弘文堂、1971年。

⑥ 綾部恒雄『東南アジアの論理と心性』東京:第一書房、1992年。

⑦ 綾部恒雄『文化人類学15の理論』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年。

⑧ 宮本延人『バリ島の研究』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1968年。

⑨ 第3次調査団「第3次東南アジア稲作民族文化調査について」『民族学研究』1964年、第1号。

下组织成立了“大阪市立大学东南亚学术探险队”。梅棹忠夫始终关注日本文明于世界中的位置,构建了一套基于地域生态的文明演进唯物史观,他对东南亚地区的调查也是对其整体性文明史观学说的实证补充。^① 探险队在他的指导下对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等中南半岛国家的生态环境、自然地理、动植物标本进行了调查;陆续出版了诸如《泰国:学术调查之旅》^②《东南亚纪行》^③等著作。围绕梅棹忠夫,依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形成了日本人类学中的“新京都学派”,即以生态学为出发点的本土生态人类学。随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文明学,主要关注个体与环境系统的整体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④

随后,关西学院大学与上智大学也陆续展开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共同调查。关西学院大学在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大岛襄二的领导下,于20世纪60年代末先后组织了两次针对菲律宾巴拉望的调查,就巴拉望岛上的山地民族的亲属制度、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物质文化等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两本学术调查报告。^⑤ 上智大学以东洋史学者、民族学家白鸟芳郎为首的团队组织了针对泰国西北部的联合调查,于1978年出版了调查报告书《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邻近诸民族》^⑥。白鸟芳郎个人于1967—1974年先后四次前往泰国山区各民族进行调查,尤其关注文化历史变迁。其研究目的不仅仅是对泰国北部山区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而且寄希望于通过对泰国山区瑶、苗两族的研究,来检验其三十多年来关于中国华南各民族所作的研究成果,并将东洋史学与民族学进行结合,借此拓展学科视野。^⑦

概言之,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在市场开拓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受到企业财团和政府机构的重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界往往以调查团、探险队的形式前往东南亚以及与东南亚接壤的中国边境、南亚诸国进行团体性质的跨学科实地调查。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民族学人类学逐渐确立了人类学田野工作范式。然而,或许正是由于过分强调团队与跨学科之间的合作,这一时期基于长时段、深度参与的田野工作较为少见,由学者个人写就的东南亚民族志专著亦屈指可数,此状况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

三、知识的社会还原:当代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1985年至今)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期间各大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设置东南亚区域研究课程与专业人才培养项目。20世纪六七十年代草创的以东南亚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与专业机构业已形成规模,如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京都大学东南亚地域研究所、东南亚学会等。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镇之一,1977年在日本万国博览会旧址的基础上改造竣工、投入使用,梅棹忠夫任首任馆长。该馆初期主要用于展览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俗风物,1989年实施大学院教育,开始为日本培养更具专业素养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型人才。实际上,该馆的创立也代表了20世纪日本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向外走、向外看的时

① 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説」『中央公論』、1957年、第2号。

② 岩波書店編集部『タイ:学術調査の旅』東京:岩波書店、1958年。

③ 梅棹忠夫『東南アジア紀行』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64年。

④ 刘正爱:《浅谈日本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中心》,载《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⑤ 関西学院大学第一次パラワン島学術探検隊『パラワン島の人と自然:関西学院大学第一次パラワン島学術探検隊報告書』兵庫:関西学院大学探検会、1968年。関西学院大学第二次パラワン島学術探検隊『パラワン島南部の山地民:関西学院大学第二次パラワン島学術探検隊報告書』兵庫:関西学院大学探検会、1969年。

⑥ 白鳥芳郎『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誌—ヤオとその隣接諸種族』東京:講談社、1978年。

⑦ 庆升:《白鸟芳郎》,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4期。

代需求。^① 目前该馆有包括副馆长平井京之介在内的近十名东南亚区域研究者。

然而,随着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社会问题以及左翼学生运动残留下来的思想遗产重新浮出水面。新一代日本学者已经对基于民族起源产生的文化相似性研究颇感不耐,依据德奥历史传播论发展出来的文化圈理论在全球化的当代受到了极大的限制。^② 日本人类学界开始关注日常生活文化现象的变迁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美国人类学在后现代思潮中关于城市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等主题的研究成果。

学科范式的转换绝非易事,必定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转换过程。首先,日本人类学逐渐从殖民、帝国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经历了反思后破茧成蝶的学术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类学完成了专业化人才培养程序的建构,意味着日本人类学逐渐从广义的综合人类学中分离开来,社会文化研究成为学科主流。其次,随着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大规模成体系的公共人类学研究开始走向日本社会的前台。日本人类学越来越重视实践应用与现实关怀,积极推动人类学知识向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所在社会的公共回归,将取自经验研究的人类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即所谓“知识的社会还原”,并将其列入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伦理纲领,成为日本人类学会乃至日本人类学界的行动准则。^③ 最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的日本人类学一直囿于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及本土生态人类学理论与范式的影响,倾向于对小规模社会的田野工作,侧重于制度功能、宗教信仰和历史变迁方面的研究。随着活跃于战前、战时学界的领导人相继离世,日本人类学界逐渐接受象征人类学、阐释人类学等以“文化”为核心概念的美国后现代人类学理论与思想。^④

具体到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在学人前辈的坚持下,规范的田野工作范式在日本人类学界已然确立。广岛大学名誉教授高谷纪夫认为,严格意义上以东南亚区域为田野对象的日本人类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说在1985年以后,才涌现出一批长期田野经验与理论创出兼具的民族志作品。^⑤ 这也意味着与学科出身驳杂,培养系统来源多样的学人前辈不同,接受过纯粹职业人类学训练的一批学术新人开始走上日本学术场域的前台,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东南亚民族志专著有山下晋司的《仪式政治学:印度尼西亚托拉查人的动态民族志》(1988)^⑥、合田涛针的《猎头与言灵:菲律宾本托克族的社会结构与世界观》(1989)^⑦、清水展的《突发事件的民族志:菲律宾尼格利陀社会的变化与持续》(1990)^⑧等。

在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文化相似性的研究,研究主题开

① [日]中牧弘著,刘正爱译:《日本人类学三讲——中牧弘允在北大的演讲(连载之二)》,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② Shinji Yamashita and Joseph Bosco and J. S. Eades, “Constructing Selves and Others in Japanese Anthropology”,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p. 90 - 113.

③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伦理纲领于2008年6月1日正式颁布,包括“作为地球市民的伦理”“针对研究地点、研究对象的伦理”“研究者之间的伦理”“针对雇主以及资助方的伦理”4个部分共12个条例。其中“知识的社会还原”列于“针对研究地点、研究对象的伦理”部分,第6条。纲领总体除了强调研究者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基本要求,还强调人类学研究的公共属性和对人类社会公共利益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这也是应用、实践以及公共人类学的基本准则之一,费孝通先生在1999年接受日本《东京新闻》采访时有过十分近似的论述:“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它的知识来自民间,作为学者就是要把来自于民间的知识体系经过学者的消化后造福当地,反馈回当地,服务于人民,而中国本身的学术也有学以致用的传统。”详情请参考: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伦理纲领」(<http://www.jasca.org/onjasca/ethics.html>)、2008年;麻国庆:《跨界与文化田野丛书总序》,李晶:《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④ C. B. Jensen and A. Morita, “Anthropology as critique of reality”, *HAU*, vol. 2, no. 2, 2012.

⑤ 高谷纪夫「東南アジア民族誌の現在」『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1991年,第20号。

⑥ 山下晋司「儀礼の政治学—インドネシア・トラジャの動態的民族誌」東京:弘文堂,1988年。

⑦ 合田涛针「首狩りと言霊—フィリピン・ボントック族の社会構造と世界観」東京:弘文堂,1989年。

⑧ 清水展「出来事の民族誌—フィリピン・ネグリート社会の変化と持続」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90年。

始多样化,产生了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包括田边繁治的泰国研究与实践理论,山下晋司的印尼研究与观光人类学,以及清水展的菲律宾研究与应答人类学。此外,一批年轻日本学人也在积极尝试开拓其他东南亚田野的工作地点,融入与世界主流人类学的讨论中。

(一) 田边繁治的泰国研究与实践理论

田边繁治(1943—),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追随京都大学著名东南亚史学家石井米雄从事泰国研究,学生时代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热衷于左翼学生运动。1978年他凭借对泰国农耕仪式的民族志研究获得日本民族学会涩泽奖,1981年以泰国北部与中部稻作农耕技术的比较研究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后,他延续青年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理论的关注,开始研究泰国佛教及守护灵仪式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仰实践,展开了从文化到实践的理论探索。

田边的宗教研究关注的是泰国都市化过程中传统仪式及媒介主体的转变。他在对泰北都市社会的考察中发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枷锁被打开,社区集体意识减弱,个体意识增强。但是通过对当地社会中灵媒崇拜现象的分析,他发现在这种连接变革与传统的新型实践活动中,一种新的社区集体意识正在形成。通过从传统仪式巫术中继承而来的实用知识,作为非传统仪式专家的灵媒在治愈和安抚患者生理疾病及心理病痛的同时,将零散的人际关系重新整合;在继承传统仪式形式和话语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社区关系和性别意识,从而在急剧城市化的夹缝中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认同。这种以不安和苦痛为媒介形成的认同感正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①

随后,田边组织了一批大型应用型研究项目,主要关注HIV患者之间是如何借助苦痛,在实践中构筑新的认同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田边及其团队主要关注身体技艺、实践知识、身份认同以及互动行为方面的问题,旨在揭示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身体实践知识是如何在传递和分享过程中创造新的人类共同体。田边提倡、由后来者补充的这一实践理论启发了日本人类学界,提供了一种关于实践的生态学双重视野:在微观层面上,社会实践体现在行为主体与客体环境之间,二者不断互动和相互修正;在中观层面上,通过将广泛的社会过程概念化,不同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相互纠缠。^②同时,田边语言功力颇深,可以熟练地使用泰语、英语、日语进行交流和著书。他凭借其具有高度原创性、理论化及国际化的泰北区域研究成果及学术贡献,于2008年和2013年分别获得了日本文化人类学会颁发的日本文化人类学奖与大同生命国际文化基金颁发的大同生命地域研究奖。

(二) 山下晋司的印尼研究与观光人类学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使得企业跨越国境开辟第三世界的市场,也产生了人口流动频繁、资本商品流转加速,信息、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变迁的新现象。日本学界一般把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物质、信息、资本等跨国境流动状态称之为“国际化”。^③日本人类学者开始关注全球人口流动、跨国观光旅游等一系列新近出现的新现象,其中,以山下晋司的东南亚研究最具有代表性。

山下晋司(1948—)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他在年轻时不满当时日本人类学仅仅以静态的比较方法研究微观社区的传统,提倡以阿帕杜莱的宏观人类学及文化景观理论将微观社会与宏观系统并置,以动态民族志研究观取代以往的静态观。1986年他凭借针对印度尼西亚托拉查人的动态

① 田边繁治「实践知としての呪術:北タイにおける憑依の身体技法覚書」『民族学研究』、1997年、第3号。

② C. B. Jensen and A. Morita, “Anthropology as Critique of Reality”, *HAU*, vol. 2, no. 2, 2012.

③ 麻国庆:《现代日本人类学的转型和发展》,载《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民族志研究,获得了东京都立大学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增强,新文化不断涌现,他开始关注观光、移民等涉及空间变化的动态过程问题,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以跨国观光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巴厘:观光人类学的课程》^①《观光人类学的挑战》^②等,成为日本观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使人类学研究与以“观光立国”的当代日本国策有机融合,继而参与了日本观光学的学科建设。^③除此之外,山下还关注文化人类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及发展,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担任日本民族学会会长期间,领导了迄今日本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最大的联合研究项目“资源人类学”,试图在联合国合作项目“人类安全计划”中建立一种公共人类学,旨在追求日、亚、非及其他地区的可持续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实现尊重移民、难民、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世界社会前景。

(三) 清水展的菲律宾研究与应答人类学

清水展(1951—),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从1977年开始以菲律宾为田野点开展人类学研究,1987年凭借对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原住民阿埃塔人的民族志研究获得了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自1977年开展菲律宾田野工作以来,清水不仅仅作为一个研究者凝视着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有意以一种战略合作的态度参与当地的发展与援助。在对阿埃塔(Aeta)原住民的研究中,清水跟踪了火山爆发后于新土地上展开社区重建的原住民,对其灾后生活方式的转变、社区运动的复兴进行了详细的民族志记录。另一方面,清水还深入参与针对阿埃塔人的紧急救援和重建工作,利用学者在公共领域的力量呼吁减少对菲律宾原住民的歧视与偏见,倡导相互理解与和平。^④作为菲律宾伊富高(Ifugao)造林运动的支持者,清水帮助当地非营利组织申请相关项目,参与项目可行性评估,使遭受环境破坏、生活难以为继的伊富高人通过植树运动获得了全球性的关注与支援。通过民族志作品将菲律宾人的诉求推向了世界。^⑤清水身体力行地探索着人类学家参与当地社会建设的途径。他这种“行动人类学家”的精神鼓励着人类学人重新思考“参与和观察”之间的平衡问题,也为追求学科应用价值的人类学人提供了新的设想。

清水凭借被他自己称作基于“愚直的田野工作”的优异学术成果,于2016年获得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奖,2017年获得日本学术界最权威的大奖日本学术院奖。他于2018年当选新一届文化人类学会会长。清水获得学士院奖并当选会长正是由于他一直以来践行的“应答人类学”这一学术理念,提倡不仅仅直面本国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类学的学科优势,连接“自我”与“他者”,在双方社会一应一答的动态过程中,共同面对日益深刻的全球性社会问题。^⑥同时,他的研究也让日本学界认识到长时段田野工作为人类普遍性知识做出贡献的必要性,微观研究也可以获得通达广阔世界的路径。

上述三位标志性学者代表了近年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的总体关怀:他们致力于人类学公共领域建设,倡导人类学知识的社会还原,以贡献人类普遍性智慧为目标。同时,还有一批年轻学者也在学术上尝试开拓新领域,他们的研究方向与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领域未来发展的趋势。例如福浦厚子主要关注新加坡这一全球资本流动中心地区的华人宗教实践问题,以宗教祭祀专家

① 山下晋司『バリ 観光人類学のレッス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② 山下晋司『観光人類学の挑戦』東京:講談社、2009年。

③ 马茜:《从山下晋司的著作回溯日本观光人类学的发展》,载《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④ 清水展『存亡の危機から民族の新生へ』『民族学研究』、1996年、第2号。

⑤ 清水展『草の根グローバルゼーション』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3年。

⑥ 清水展『巻き込まれ、応答してゆく人類学』『文化人類学』、2016年、第3号。

“童叟”为切入点,关注全球人口流动与个体化、政治经济权力中心化等当代现实问题。^① 梶丸岳则借助老挝追善祭奠仪式之夜举行的对唱歌曲探讨民族志诗学和语言诗学问题,参与了关于雅各布森的句法学、构词学以及希尔弗斯坦的符号学的理论对话,同时以“山歌”为切入点关注中国西南地区的语言交替以及文化复兴现象。^② 寺户宏嗣以越南河内的联合国支援建设项目为例,研究在城市发展的行政决策过程中技术、政治和理论的复杂性和不协调性。^③

现在,日本进入超少子高龄化阶段,为了维持日本经济活力,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逐渐放宽移民条件,允许体力劳动者进入日本。2020年末已经有270余万外国人生活居住在日本,占日本总人口的2%左右,其中东南亚人占外国人总数的1/4左右。在此背景下,日本人类学针对境内东南亚移民群体的研究也正在进行,展开了从“单一民族”国家到“多文化共生”的反思,重新开始思考人权、公民权等现代社会问题,构建日本公共人类学话语体系,如岩佐光广就在持续关注老挝移民在日本的社区建构与社会关系重组过程等问题。^④

综上所述,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逐渐走出了为结构功能主义所宰制的理论范式,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已呈现多元化态势:一方面重视东南亚丰富且独特的文化现象研究,认识到语言能力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倾向于开展长时段、深度参与的田野工作,获得了日本知识界的认可;另一方面重视人类学知识的转换研究与理论建构,他们都倾向于将从经验研究中获取的知识回馈给研究对象,为其解决其现实问题提供依据与参照,即所谓“知识的社会还原”,从而提高了人类学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四、结语: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历程与范式转换

日本针对东南亚地区开展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日本人类学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历程与范式转换体现了日本知识界自我认知和对世界认知的曲折经过:先是在身份认同焦虑之下试图论证民族起源假说(证明自己是谁),然后到经济扩张时期采取实用主义取向的客观研究(证明他者是谁),再到打破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拥有更高伦理诉求的世界主义理念(自我与他者相互成全),这同时也是日本人类学界逐步确立主体性的复杂历程,对于中国学界很有启发性意义。

纵观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存在着两个基本主题:一是对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的关注,其次是对“他者文化”——尤其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关注,这两个方面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的。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治或思想中心,长久以来都需要依靠“他者”对自身进行定位,这一参照对象最初是中国,后来逐渐拓展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其他国家与地区。明治维新以后,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中,日本试图在新的区域版图中确立自身的中心性。关本照夫20世纪末提出了“离心趋势”这一概念解释日本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情况,即日本人类学家在各个时期都倾向于前往相较日本中心区域更偏远的地区进行田野工作,这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确证自身中心性的努力。^⑤ 同时,比起关注文化之间差异性的西方人类学者,传统上的日本人类学者更倾向于在比较研究中关注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与其说这是为了研究“他者”,不如说是为了了解“自我”。二战时期日本人类学者在东南亚等殖民区域开展研究的目

① 福浦厚子『都市の寺廟——シンガポールにおける神聖空間の人類学』横浜:春風社、2018年。

② 梶丸岳「掛け合い歌はどのように場に埋め込まれるか」『文化人類学』、2020年、第4号;梶丸岳「中国貴州省の掛け合い歌『山歌』におけるコードスイッチング」『社会言語科学』、2013年、第2号。

③ 寺戸宏嗣「伸縮するバスインターチェンジ」『文化人類学』、2010年、第2号。

④ 岩佐光広「在日ラオス系定住者の相互扶助の展開過程」『文化人類学』、2012年、第2号。

⑤ 関本照夫「日本の人類学と日本史学」『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別巻1』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47-123頁。

的,正是试图证明这些区域与日本民族的同源性,并通过担负起照顾“未开化”民族的重任赋予殖民统治以合法性。为此,日本针对东南亚的人类学研究,无法脱离日本中心论的思想桎梏,问题意识始终聚焦于日本这一“自我”。试图构建一种关于世界整体性文明史观的梅棹忠夫曾辛辣地批判彼时日本知识界:“令我感到惊叹的是,日本知识界诸君对日本以外的世界毫无真切的关心。”^①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后,日本学界重新展开了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殖民人类学时期的主题,例如试图通过对东南亚稻作文化的考察,来寻求日本和东南亚的文化亲缘关系,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反思既往研究中的伦理缺失,并通过借鉴西方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树立起规范的田野工作方法,研究主题也开始多样化。此时针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日本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贸易市场的开拓,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倾向。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一个过渡阶段,如果说前一个时期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谁,那么这一时期该领域则更多表现出对他者的兴趣,其研究范式带有较强的经验主义的客观化色彩。

日本人类学界的自我中心倾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彻底得到了纠正。日本人类学的新一代学人在与西方学界的互动中,极具反思性和批判性地直面日本侵略与殖民这一负面历史。日本人类学者在关于东南亚社会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关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被研究社会的动态变迁,秉持知识取自社会、用于社会的伦理立场,创造性地提出“应答人类学”的理念,倡导连接“自我”与“他者”,共同面对全球性社会问题。这些理论视角和观点超越了区域研究和经验研究的范畴,在日本人类学界受到广泛赞誉,积极推动了日本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至此,当代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对“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革命性的转换,东南亚不再是用来证明自我中心性的工具,也不再是静态的被描摹的客观对象,而是成为日本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开展对话、合作和共同行动的重要场域。这些主张也与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的倡议不谋而合,例如高丙中提出的“世界社会”的理念,^②龚浩群谈到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③皆旨在通过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边界的跨越,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共生性,探索彼此共同卷入的复杂网络和各种力量以及交互影响的途径。

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也呼应了日本思想界关于“作为方法的区域”的重要讨论——区域被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以此构成方法论创造的依托。20世纪60年代,竹内好针对当时日本知识界普遍以日本为中心进行思考的现状,在差异性比较的基础上试图将“亚洲”进行概念抽出,提出所谓“方法”便是聚焦区域主体形成的过程。^④到了20世纪90年代,沟口雄三提出日本学界开展的中国研究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⑤。在他看来,日本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进行中国研究,建构了一个想象中的中华文明,以此满足自身在文化、政治上的需要。由此,沟口雄三委身中国本土概念,使用中国概念去观察和理解中国,在分析中日思想史异同的基础上,达到理解亚洲乃至世界的目的,进行着“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尝试。^⑥中国学者孙歌也在与日本思想界持续互动的同时,倡导发现世界的多主体性,不仅仅将区域作为对象,而且作为方法,以此来建构主体形成的机能性。^⑦

① 梅棹忠夫『生態史観から見た日本』『文明の生態史観』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年、第128-146頁。

② 高丙中:《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新生命》,载《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

③ 龚浩群:《冷与热:海外民族志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④ 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93年、469-470頁。

⑤ 沟口雄三、汪晖:《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载《读书》,1994年第4期。

⑥ 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⑦ 孙歌:《“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思想可能性》,载《电影艺术》,2019年第6期。

回到日本人类学界的东南亚区域研究,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双方面的主体形成的过程:一方面,东南亚从被考察的工具和客体,转变为具有自身诉求和平等地位的主体;另一方面,日本人类学界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视界中解放出来,不再是自说自话,而是以更为平等包容的姿态,探索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构筑的世界——百年前“我从哪里来”的身份焦虑蝶变为自我反省和参与式行动,这代表着日本人类学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这种交互主体性的获得正是日本人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总之,东南亚之于日本人类学界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社会文化概念,而且是日本人类学界借以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方法,也是日本知识界沟通世界,生产独创性知识的重要场域。今日,中国学界也逐渐认识到海外民族志研究拓展智识边界的潜力。本文希望通过爬梳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予国内学界以启发:走出国门研究世界,是中国在世界学术格局中从被研究对象转变为研究主体的开始,但是,中国学界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需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倾向,只有充分认识到“他者”的主体性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共生性,我们才有可能在交互主体性当中实现自我与他者的两全——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对世界保持最“真切的关心”。

Abstract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tudy is a way with which Japanese anthropologists have established their own subjectivit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field for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 and produce original knowledge. In early imperial Japa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mainly served colonial rule and tried to prove the hypothesis of the origin of the Japanese nation.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mid-1980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was in line with Japan's nation-state 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radually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ary norms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a bid to understand Southeast Asia relatively objectively. Since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concern in this field, advoca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jointly facing increasingly profound global problems,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public return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to the society where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objects live, namely the so-called “social restor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tudy of Japanese anthropology has accomplished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self-proof (proving who one is) and proof of the other (proving who the other is) to mutual complementation (self and the other complete each other).

(龚浩群,教授;李一言,硕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黄凌翹]